

南方复起与隋文帝江南政策的转变

韩 昇

摘 要 隋朝平陈后,普遍更改南方地方行政建制,大批任命北方官员,强制推行北方社会制度,激成南方地方豪族领导的广泛的反隋斗争。这一反抗被镇压后,隋朝也以此为契机,转而采取以怀柔为主的方针,在维护国家统一和政治服从的前提下,允许南方社会在一定程度上保持其原有形态,容忍多样性社会的存在。

关键词 隋 江南 怀柔 多样性社会

一

开皇十年(590)底,也就是在隋朝平陈一年后,江南爆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抗运动,把隋朝君臣从一厢情愿的太平梦中唤醒。

偌大一个江南王朝,虽在一个多月的时间内就被隋朝平定,但陈朝赖以维持的社会基础并没有改变,散兵游勇和地方武装仍潜伏于各地,在一般民众社会中,对外来统治者的不理解以及由此自然产生的抵触心理普遍存在。建康(今江苏省南京市)陷落后,地方上的零星反抗,已经表明把江南融入北方社会将是布满荆棘与陷阱的道路。

江南最为富庶的吴州(今江苏省苏州市)地区,在建康被攻破后,立即推萧玘为主,进行抵抗。萧玘从后梁奔陈,在吴州时间不长,能够聚众而起,主要在于地方势力对北方统治的恐惧。故其登高一呼,远近迅速响应,永新侯陈君范自晋陵郡(今江苏省常州市)率部与之会合,对建康造成威胁。^①在内地,湘州(今湖南省长沙市)刺史岳阳王叔慎及其僚佐刑性结盟,“招合士众,数日之中,兵至五千人。衡阳(今湖南省衡阳市)太守樊通、武州(今湖南省常德市)刺史郇居业,皆请赴难。”^②但最后寡不敌众,被杨素派出的重兵所镇压。

这些反抗倏忽而起,远近闻风响应,说明江南社会对隋朝统治颇有抵触。只是当时陈朝土崩瓦解,士气低落,新兵又不习战阵,所以,很快就被遍布各地的隋军所镇压。昙花一现的反抗,给隋朝造成陈人不堪一击的印象,反而掩盖了实质性的社会发展差异问题。

二

南北分治已久,从生活习俗到生产方式、制度文化都在各自发展过程中差距日大,要把这两个社会统一起来,必然会产生许多矛盾与冲突,需要周密计划,谨慎行事,而且还需要宽容与耐心。可是,隋军的迅速胜利,使得隋朝执政者把改造江南的任务想象得过于容易。他们把

陈朝君臣带回京城,供养起来,示以怀柔,算是给江南树立榜样。同时,把“江南士人,悉播迁入京师”³,境遇凄凉,以此除却将来动乱的因素。在江南当地,则厉行北方制度,看不出对江南社会特点有所考虑,具有很大的强制性,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。

第一,大量改变原南朝行政区划。在北方,隋朝早于开皇三年(583)实行了废郡的地方行政制度改革。现在,全国统一了,文帝立即将此项改革在南方推行。开皇九年(589)正月二十九日,也就是攻克建康不到十天,文帝就派出第一批使者前往江南巡抚。监察御史房彦谦奉诏安抚括州(今浙江省丽水市东南)、泉州(今福建省福州市)等十州,⁴可知使者足迹几乎遍及南方。肩负地方制度改革重任的有左领军长史长孙炽,“持节,使于东南道三十六州,废置州郡,巡省风俗。”⁵

根据北方实行的地方制度,南方的郡也基本予以废除。同时,还废省合并一些州和县,有些区划则予以调整改名,并增设一些州县。⁶地方制度的改革固然必要,但是,操之过急,则对于盘根错节的门阀世族利益打击太大,普通民众一时也难以适应,更何况有些变动纯粹是为了加强对江南的统治,例如将南朝古都荡平还耕,以及扬州(今江苏省江都市)、南豫州(今安徽省当涂县)、吴州等中心地带行政建制的改变,都带有十分浓厚的征服色彩,自然引起反感。

第二,基本撤换南方地方长官。平陈以后,原陈朝上层地方官员不是被押往北方,就是被废黜于家,罕见留任,而代之以隋朝任命的官员。例如,韩洪、张昺和郭衍先后担任蒋州(今江苏省南京市)刺史;皇甫绩和刘权任苏州(今江苏省苏州市)刺史;杨异和宇文弼任吴州总管;王世积任荆州(今湖北省荆沙市)总管;韦洸任江州(今江西省九江市)总管;杜彦任洪州(今江西省南昌市)总管;侯莫陈颖和李圆通任饶州(今江西省波阳县)刺史;席世雅和杨荣任宣州(今安徽省宣州市)刺史;杨初任常州(今江苏省常州市)刺史;马敬和刘景安任杭州(今浙江省杭州市)刺史;韦冲检校括州事等等,这些官员无一例外的为北方人,这种局面直到隋炀帝时代才逐步有所改变。显而易见,文帝对江南地方人事的安排也完全是征服式的。

第三,整顿乡村,推行户籍制度。隋军攻克建康后,立即宣布:“制五百家为乡,正一人;百家为里,长一人。”⁷选择这样的时机颁布重组乡村的政令,明显具有统一全国乡村政权的意图,实施范围应该包括江南地区在内。而且,隋朝还试图在江南实行北方的户籍制度。平陈后派到江南巡抚的使者回京后,“奏言江表依内州责户籍。上以江表初平,召户部尚书张婴,责以政急”⁸。乡正为政府在乡村的胥吏,检括户口则直接冲击大量荫占人口的世族社会,两项措施都是为了将政府权力贯彻到农村,却与江南世族社会的现状相去甚远,真正强制推行,势必引起激烈的反抗。

第四,强制灌输北方统治者的意识形态。文帝大力倡导孝治,并以儒家所谓“父义、母慈、兄友、弟恭、子孝”⁹的五教来宣传贯彻。这些纲常伦理并非泛泛空言,苏威曾将五教具体化,责成地方官每年进行检查处罚。¹⁰现在,苏威又将这一套搬到江南,强制灌输,令“无长幼悉使诵五教。威加以烦鄙之辞,百姓嗟怨”¹¹。隋朝大力贯彻的儒家伦常不是要巩固世家大族的统治,恰恰相反,是要导孝为忠,提高中央集权,削弱豪族势力,与江南世族意识形态直接冲突。

隋朝在江南推行的,不仅是中央集权化统治,而且是具有浓厚征服色彩的高压政治,企图从根本上动摇世族垄断乡村的社会基础,用北方农耕社会的模式来改造江南,谋求政治上的统一。但是,在推行这些政策的时候,确实存在无视江南社会特性与历史背景的倾向。唐朝及其后的历史学家都敏锐地指出:“江表自东晋已来,刑法疏缓,世族凌驾寒族;平陈之后,牧民者尽

更变之。苏威复作《五教》，使民无长幼悉诵之，士民嗟怨。”¹⁰²

三

上述措施的后果很快显现了出来。开皇十年(590)年底,看似平静的江南,街头巷尾人们相互探询,听说隋朝要将他们都迁徙到北方去。平陈后隋朝曾把江南士人都迁入关中,这似乎给眼下的传言提供佐证,人们越发惶恐不安。就在这当口,婺州(今浙江省金华市)汪文进、越州(今浙江省绍兴市)高智慧和苏州沈玄侓等首先举起反旗,于是,一场声势浩大的反抗运动爆发了。兹将其基本情况整理如下表。

平陈后南方复起基本情况表

| 领导人 | 组织形态 | 活动区域 | 资料出处 |
|-----|------------|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汪文进 | 自称天子,署置百官 | 婺州、宣州 | 《隋书》高祖下、杨素传、来护儿传。段达传 |
| 高智慧 | 自称天子,署置百官 | 越州、泉州、闽越 | 《隋书》高祖下、杨素传、来护儿传。 |
| 沈玄侓 | 自称天子,署置百官 | 苏州一带 | 《隋书》高祖下、杨素传。 |
| 朱莫问 | 自称南徐州刺史 | 京口 | 《隋书》高祖下、杨素传。 |
| 鲍迁 | 自称晋陵都督 | 晋陵 | 《隋书》高祖下、杨素传。 |
| 顾世兴 | 自称晋陵太守 | | |
| 叶略 | | 无锡 | 《隋书》高祖下、杨素传。 |
| 陆孟孙 | | 松江 | 《隋书》高祖下、杨素传。 |
| 顾子元 | 响应高智慧 | 苏州 | 《隋书》皇甫绩传。 |
| 蔡道人 | 自称大都督,属汪文进 | 乐安县 | 《隋书》高祖下、杨素传。 |
| 李棱 | 自称大都督,属高智慧 | 蒋山 | 《隋书》高祖下、麦铁杖传。 |
| 沈雪 | | 黟、歙 | 《隋书》高祖下、杨素传。 |
| 沈能 | | | |
| 吴世华 | 自称大都督 | 饶州 | 《隋书》高祖下、张弼传。 |
| 沈孝彻 | 自称大都督 | 温州 | 《隋书》高祖下、杨素传。 |
| 杨宝英 | 自称大都督 | 杭州 | 《隋书》高祖下。 |
| 陶子定 | | 东阳 | 《隋书》韦冲传。 |
| 罗慧方 | | 吴州 | 《隋书》韦冲传。 |
| 陈正绪 | | 三吴地区 | 《隋书》陆知命传。 |
| 萧思行 | | | |
| 王国庆 | 自称大都督 | 泉州 | 《隋书》高祖下、杨素传。 |
| 盛道元 | | 泉州 | 《隋书》来护儿传。 |
| 李春 | 自称大都督 | 交州 | 《隋书》高祖下。 |
| 王仲宣 | 番禺夷 | 番禺 | 《隋书》韦洸传。 |
| 徐璿 | | 江南(饶州?) | 《隋书》柳庄传 |

这场反叛席卷南方,他们“攻陷州县。陈之故境,大抵皆反,大者有众数万,小者数千,共相

影响,执县令,或抽其肠,或齧其肉食之,曰:‘更能使依诵《五教》邪!’”^⑧表中列举的只是较有势力与影响而能见诸史册者。其中,最主要的有汪文进、高智慧和沈玄侓三支,他们都自称天子,署置百官,而实力较小者则依附于他们,自称大都督等,尤其痛恨隋朝派来的地方官吏和强制灌输的《五教》。据此看来,他们起兵的目的不是要复辟陈朝。陈朝在江南之不得人心,在韩擒虎渡江时“江南父老素闻其威信,来谒军门,昼夜不绝”^⑨的情况,得到充分的表现。所以,如此众多民众参加的反抗,不能视为对国家统一的反动,而是对隋朝统治的不满。

叛军首领的个人情况基本上已经无从考索,仅能知道其一鳞半甲。如“高智慧、汪文进等作乱江南,庐江豪杰亦举兵响应”^⑩，“泉州人王国庆，南安豪族也，杀刺史刘弘，据州为乱，诸亡贼皆归之”^⑪，由此推测他们大多为乡村豪族，当可成立。反叛被镇压之后，杨素家“有鲍亨者，善属文，殷胄者，工草隶，并江南士人，因高智慧没为家奴”^⑫，可为佐证。正因为如此，所以他们具有很大的在乡势力和号召力，能够呼啸而起，得到广泛支持。就以高智慧为例，其党徒“往往屯聚，保投溪洞”^⑬，史万岁镇压高智慧时，“率众二千，自东阳别道而进，逾岭越海，攻陷溪洞不可胜数。前后七百余战，转斗千余里”^⑭，由此不难看出，高智慧集团的基础是遍布各地的村落坞堡之类组织，故史万岁仅二千军众就能长驱深入，但每前进一步，都要经过战斗。这场遍及南方的反抗，基本上属于豪族领导的反对隋朝外来统治的斗争，目的在于维持南方既有的生产生活方式与社会组织形态，其背后是世族政治与中央集权政治、地主经济模式与国家垄断经济模式的斗争。

四

江南如此大规模的反抗，确实是文帝始料未及。消息传来，他冷静地判断形势，丝毫不敢疏忽大意。十一月，他作出一个正确的决断，派遣刚回京升任内史令的杨素率大军出征。杨素是隋朝最具谋略也最为冷酷的军事家，派遣他前往江南镇压，并为他配属崔弘度、史万岁、来护儿等骁将，表明文帝对江南乱事的高度重视，决意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，迅速予以扑灭，不使蔓延成势。

杨素率水军出扬子津，克京口，破晋陵，发动强大的攻势。刚开始，战事进展比较顺利，经过几场苦战，击溃大股叛军的抵抗，扭转了江南的局势。但是，如上表所见，南方反叛的区域很广，响应者众多，所以，杨素的军队不久就像进入泥潭一般，必须与敌军逐个溪洞进行争夺。他亲自率领的部队在击破温州沈孝彻后，挺进天台，“逐捕遗逸寇，前后百余战”^⑮。其部将史万岁亦是“前后七百余战，转斗千余里”，艰难地向南推进。

在江浙地区，隋军固然取得进展。但是，南方的情况却相当糟糕。泉州王国庆围攻泉州百余日，杀刺史刘弘，占领州城。番禺夷人王仲宣聚众造反，岭南首领多响应之，遂引兵进攻广州，广州总管韦洸勒兵出战，为流矢所中，战死军中。

显然，一味进行军事镇压，并非长远良策，文帝又作出一项具有战略意义的决定，任命并州总管晋王广率师增援江南，仍任扬州总管，调秦王俊回任并州总管。

晋王广曾是平陈统帅，又娶后梁公主为妃，与江南关系颇深。派他回到江南，表明文帝在这期间对其江南政策有所反思，并开始进行战略性调整。亦即注意统治江南的策略，修正以往的高压政策，采取一些怀柔手段。

这种政策性修正,可以从具体的事例反映出来。晋王广到达江都之后,双管齐下,一方面加强军事进攻,命令行军总管郭衍率精兵万人屯京口,与叛军接战,大破之,乘胜进“讨东阳、永嘉、宣城、黟、歙诸洞,尽平之”^⑧。另一方面则招降纳叛,进行招安。陆知命是吴郡富春人,陈灭后,废黜在家,“晋王广镇江都,以其三吴之望,召令讽谕反者。知命说下贼十七城,得其渠帅陈正绪、萧思行等三百余人。”^⑨以后,杨素再度出征,由海路入泉州,大破王国庆,诱其捕斩高智慧,这才大致平息江南的反叛。杨素也因功取代苏威,升任尚书右仆射。苏威被免职在开皇十二年(592)七月,杨素继任则在同年十二月。由此推测,江南的反抗大约坚持到这年年中,亦即至少持续了一年半以上。^⑩佛教文献记载:“开皇十一年,江南叛反,王师临吊,乃拒官军,羽檄竞驰,兵声逾盛。时元帅杨素整阵南驱,寻便瓦散,俘虏诛剪三十余万”^⑪,证明战事在开皇十一年(591)仍在进行,而决非如文献记载的那样,似乎在开皇十年(590)底就被镇压下去。^⑫

当时,江南人口约为六十万户,竟有三十余万人参加这场反抗,不难想象当年战事之惨烈。南方社会如此广泛参加的反隋斗争,不可能完全被军事力量所镇压。实际上,杨素回京后,南方的反抗斗争仍时起时伏地进行着。开皇十二年,刘权被任命为苏州刺史,“于时江南初平,物情尚扰,权抚以恩信,甚得民和”^⑬;韦冲受命检校括州事时,还遇上陶子定和罗慧方聚众围攻婺州永康、乌程诸县,被他率部镇压下去。^⑭所以,杨素回京仅仅表明大规模的军事镇压告一段落。此后,江南大局由晋王广主持,绥抚政策占了上风。岭南的事例典型反映出文帝态度上的变化。

陈朝一灭亡,文帝立即命令韦洸进军西南。其时,岭南数郡共尊洗夫人为“圣母”,保境拒守,而陈豫章(今江西省南昌市)太守徐璠也退据南康(今江西省赣州市),阻断韦洸进路。后来,晋王广令陈后主致书洗夫人,使之归隋,韦洸得以进入广州,说谕岭南,诸州皆定。一年后,番禺夷王仲宣起兵,杀总管韦洸。其造反的主要原因在于隋朝的高压政策。后来隋朝改变策略,夷、越溪洞渠帅前后对比道:“前时总管皆以兵威相胁,今者乃以手教相谕,我辈其可违乎?”^⑮即可证明这一点。

王仲宣造反,岭南首领多起而响应。但洗夫人却支持隋朝,她派遣其孙冯盎统军出击,与文帝派来增援的裴矩会师,共同讨平王仲宣。洗夫人披甲骑马,护卫裴矩巡抚诸州,苍梧(今广西省梧州市)首领陈坦、冈州(今广东省新会市北)冯岑翁、梁化(今广西省鹿寨县)邓马头、藤州(今广西省藤县东北)李光略、罗州(今广东省化州市)庞靖等都前来参谒。值得注意的是文帝授权裴矩便宜行事,使他能“承制署其渠帅为刺史,县令。及还报。上大悦,命升殿劳苦之”^⑯。由于裴矩让当地首领“还令统其部落”,故“岭表遂定”。而且,文帝还因为洗夫人拥隋立功,册封她为谯国夫人,得以“开谯国夫人幕府,置长史以下官属,给印章,听发部落六州兵马,若有机急,便宜行事”^⑰,同时,还封其孙冯盎为高州(今广东省阳江市西)刺史。任用当地人,甚至允许地方署置官员,这与隋朝人事任免权尽归中央的基本原则大相径庭,是文帝专门针对南方社会而采取的特殊政策。

显然,席卷南方的反抗运动使文帝深刻认识到南北社会的巨大差异,开始承认江南社会的特点,在维护国家统一和政治服从的前提下,适当作出让步,允许南方地区在一定程度上保持其原有的生产生活方式,甚至组织形式,容忍多样性社会的存在。由于贯彻怀柔政策,文帝还约束和制裁中央派往南方官吏的不法行为。番州(广州)总管赵讷为官贪虐,致使徕、獠多有亡叛。洗夫人专门遣长史给文帝上封事,论安抚之道,列数赵讷罪状。文帝得报,法办赵讷,并下敕委

托洗夫人招慰亡叛。

文帝对南方的怀柔并非权宜之计,终文帝之世均可看到他对南方吏治与怀柔的高度重视,以下几个事例足以说明这一点。

乞伏慧、令狐熙和侯莫陈颖都是文帝激赏的清官,他们先后被派往南方任职。乞伏慧任荆州总管“其俗轻剽,慧躬行朴素以矫之,风化大治”^①。令狐熙为桂州(今广西省桂林市)总管十七州诸军事,“熙至部,大弘恩信”^②,当地溪洞渠帅相率归附,令狐熙还在各地建设城邑,开设学校,大阐文教,深得华夷各族爱戴。仁寿年间,朝廷因“岭南刺史、县令多贪鄙,蛮夷怨叛”而派邢州(今河北省邢台市)刺史侯莫陈颖为桂州总管十七州诸军事。侯莫陈颖到任后,果然不负重托,“大崇恩信,民夷悦服,溪洞生越多来归附”^③。

炀帝时代,文帝的怀柔政策得到继承并有发展,江南的地位大有提高。在怀柔政策下,江南社会的特质在相当程度得到保存,隋朝在北方实行的政策制度,例如与江南社会生产方式相去甚远的均田制等,看不到有在南方实施的迹象与证据。江南的这场反抗及其对隋朝江南政策转变的影响,使我们在隋朝严厉的集权统治体制中,首次看到对异质社会的宽容。形成这种结果,从客观上说,是江南反抗运动的深厚社会基础,而从主观上说,是文帝在平陈后威望隆重以及由此而来的政治自信。他表现出令人意外的耐心,务实地把南北两种社会的磨合作为长期任务,逐步加以解决。

注:

①参阅《隋书》卷 79,《外戚·萧岿传》,第 1794 页;卷 61《宇文述传》,第 1464 页,中华书局校点本。

②《陈书》卷 28《岳阳王叔慎传》,第 371 页,中华书局校点本。

③《隋书》卷 21《天文上》,第 612 页。

④《隋书》卷 66《房彦谦传》,第 1562 页。

⑤《隋书》卷 51《长孙览附长孙炽传》,第 1329 页。

⑥平陈后南方地方行政区划的变更,请参阅《隋书》卷 31《地理下》。

⑦《隋书》卷 2《高祖下》,第 32 页。

⑧《北史》卷 63《苏绰附苏威传》,第 2245 页。根据这段记载,平陈后,苏威迁尚书右仆射,持节巡抚江南,但《隋书·高祖纪》记其出使时间在开皇十五年(595),两相抵触。文帝遣使巡抚江南在正月,而苏威任尚书右仆射在闰四月十七日,时间上颇有差距。而且,苏威旋因母忧去职,后由文帝下诏夺情起复,综合起来看,苏威或未于开皇九年(589)初出使江南。然而,并不能因此而否定《北史》的上引记载,特别是记载中提到户部尚书张婴,根据《隋书》纪传参酌考证,可知开皇七年至十年在任的户部尚书为张婴,故“张婴”虽为“张嬰”之讹,却与史实相符。可证隋朝确曾在江南推行户籍制度。

⑨引文见《左传·文公》十八年条。《尚书·舜典》说:“汝作司徒,敬敷五教。”

⑩《隋书》卷 66《郎茂传》记载:“时尚书右仆射苏威立条章,每岁责民间五品不逊。”

⑪《北史》卷 63《苏绰附苏威传》,中华书局校点本,第 2245 页。

⑫《资治通鉴》卷 177“隋文帝开皇十年(590)十一月”,第 5529 页,中华书局校点本。司马光的这段话,基本抄自《北史》卷 63《苏绰附苏威传》而略有订正删减,代表了唐代以来历史学家对江南反叛原因的见解。

⑬《资治通鉴》卷 177“隋文帝开皇十年(590)十一月”,中华书局校点本,第 5530 页。

⑭《隋书》卷 52《韩擒虎传》,第 1340 页。

⑮《隋书》卷 64《陈棱传》,第 1518 页。

⑯⑰⑱《隋书》卷 48《杨素传》,第 1285、1288、1284 页。

- ⑱《隋书》卷 55《杜彦传》，第 1372 页。
- ⑲《隋书》卷 53《史万岁传》，第 1354 页。
- ⑳《隋书》卷 61《郭衍传》，第 1470 页。
- ㉑《隋书》卷 66《陆知命传》，第 1560 页。
- ㉒参阅气贺泽保规《论隋代江南的异动》，《鹰陵史学》第 2 号，1976 年。
- ㉓《续高僧传》卷 30《隋杭州灵隐山天竺寺释真观传》。
- ㉔《隋书》卷 2《高祖下》和《资治通鉴》卷 177“隋文帝开皇十年(590)”均将平叛战事记于开皇十年(590)底，似乎十一月爆发的江南反叛在翌月就被轻而易举地镇压了。
- ㉕《隋书》卷 63《刘权传》，第 1504 页。
- ㉖⑱《隋书》卷 47《韦世康附韦冲传》，第 1270 页。据岑仲勉《隋书求是》第 240 页考证，韦冲任括州刺史在开皇十二年(592)以后。
- ㉗《隋书》卷 56《令狐熙传》，第 1386 页。
- ㉘《隋书》卷 67《裴矩传》，第 1577 页。
- ㉙《隋书》卷 80《列女·谯国夫人传》，第 1803 页。
- ㉚《隋书》卷 55《乞伏慧传》，第 1378 页。
- ㉛《隋书》卷 56《令狐熙传》，第 1386 页。其任职时间据《金石萃编》卷 56《令狐熙碑》。
- ㉜《隋书》卷 55《侯莫陈颖传》，第 1381 页。

作者 厦门大学历史系教授 责任编辑 陈双燕

(上接第 11 页)

- ③列维·布留尔：《原始思维》，商务印书馆 1995 年版，第 5 页。
- ④布洛克特：《世界戏剧艺术欣赏》，转引自鞠基亮《宗教与世俗的选择》，《戏剧艺术》1989 年第 4 期，第 87 页。
- ⑤鞠基亮：《宗教与世俗的选择》。
- ⑥⑦卢卡契：《审美特性》第 1 卷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6 年版，第 68、333 页。
- ⑧M·巴赫金：《巴赫金文论选》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6 年版，第 102 页。
- ⑨胡健国：《巫雩与巫术》，海南出版社 1993 年版，第 7 页。
- ⑩皇甫重庆：《观众对戏剧的参与》，文化艺术出版社 1991 年版。
- ⑪刘春江：《江西青阳腔目连戏宗教仪式》，《戏曲研究》第 37 期。
- ⑫陈世雄：《戏剧思维》，福建教育出版社 1996 年版，第 7 页。
- ⑬张岱：《陶庵梦忆》，西湖出版社 1982 年版，第 50 页。
- ⑭H·帕克：《艺术的功能：艺术与宗教》，张锡坤主编《世界三大宗教与艺术》，吉林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。
- ⑮波斯彼洛夫：《文学原理》，三联书店 1986 年版，第 4 页。
- ⑯尼采著、周国平译：《悲剧的诞生——尼采美学论文选》，三联书店 1986 年版，第 26、776 页。
- ⑰余秋雨：《中国现存原始演剧形态美学特征初探》，《中国戏剧起源》，知识出版社 1990 年版，第 201 页。

作者 厦门大学中文系硕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 贺秀明